

两汉三家《诗》学史纲

◎ 俞艳庭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LIANGHIAN SANJUJASHIXUE SHIGANG

齊魯書社

两汉三家《诗》学史纲

◎ 俞艳庭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JIANGHAN SANJIAOSHIXUE SHIGANG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三家《诗》学史纲 / 俞艳庭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9.9

ISBN 978—7—5333—2265—6

I. 两... II. 俞... III. 诗经—文学研究—中国—两汉时代 IV. 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761 号

两汉三家《诗》学史纲

俞艳庭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 com. 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265—6

定价：30.00 元

总序

这套《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的问世,是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建设结出的一颗硕果。作为省级重点学科,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校、院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构建学术梯队,强化科研意识,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层次合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队伍。先秦文化与诗学、宋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学科中较为突出的几个研究方向。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为本学科高层次学术成果提供一个良好、有效的发展平台,希图进一步积攒力量,夯实基础,扩大影响,为学科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本学科的学术骨干和学术梯队的核心成员,他们绝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有的还曾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过研究工作。这些成果凝结了作者数年来的心血,同时也将是其未来学术之路的重要奠基石。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传统的学术研究早已走出单一、狭窄、封闭的格局。作为中青年学者,既要秉承传统学术方法的熏陶与滋养,又须具备接受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灵敏触角,

唯其如此，才有希望开辟出一个学术研究的新纪元。从这一点出发，本套丛书选题的中心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但其实际涉及面却较为广阔：既有传统的作家作品或某一时期文学的个案研究，又有宏观的综合文化研究。文学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与社会历史文化割裂的，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常常习惯于将社会历史文化作为文学的背景，这样，被关注的对象就只能是一条纵向的线式“文学史”。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就力图突破这种观念，将思想、哲学、艺术、宗教等纳入“大文学史”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文学存在的本真面目。这在我们来说，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尝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社会历史学的考据论证和理论阐发等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又不乏诸如诠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尝试运用。总之，力求做到兼容并蓄，多方面开拓研究视野。

为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济南大学的相关领导给予了殷切的关怀，有关部门提供了出版基金，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齐鲁书社的陈修亮编辑积极策办丛书的出版事宜，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随着济南大学各个学科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光辉的顶点攀登。与兄弟院校的同行们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但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和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未来之路是无限光明的。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两汉三家《诗》学兴衰迭代概观	7
第二章 西汉《鲁诗》元王派	35
第一节 刘交和汉初《鲁诗》学术集团	36
第二节 刘向的说《诗》特点及其对《鲁诗》的改造	45
第三节 刘歆:从经师到国师	68
第三章 西汉《鲁诗》申公派	79
第一节 申公和他的弟子们	80
第二节 班丘江公与《鲁诗》的传播	95
第三节 许生与《鲁诗》的授受	102
第四节 司马迁与《鲁诗》	110
第五节 《鲁诗》韦氏学	122
第四章 东汉《鲁诗》学	131
第一节 王莽篡汉期间和东汉初期的《鲁诗》学	131
第二节 东汉中期的《鲁诗》学	137
第三节 东汉后期的《鲁诗》学	147
第五章 西汉《齐诗》学的兴盛	160

第一节 辕固的政治、学术观及其影响	161
第二节 董仲舒、夏侯始昌对《齐诗》的 阴阳五行化改造	167
第三节 后苍和他的弟子们	188
第四节 《齐诗》翼氏学	196
第五节 匡衡与《齐诗》	209
第六章 东汉《齐诗》学的衰微	218
第一节 王莽篡汉前后的《齐诗》学	218
第二节 东汉《齐诗》学概览	227
第七章 《韩诗》在西汉的传授	240
第八章 《韩诗》在东汉的极盛	252
第一节 薛汉及其后学	253
第二节 东汉其他《韩诗》学者	262
第九章 历代三家《诗》辑佚述略	284
第一节 《诗考》——筚路蓝缕	285
第二节 元明——不绝如线	288
第三节 清代——蔚为大观	289
第四节 《韩诗外传》的校定与辑佚	299
结束语	303
附录一 两汉《诗》学授受表	307
附录二 三家《诗》著述考	314
附录三 《褰裳》朱熹“男女相咎”说探源	328
附录四 韦玄成未曾以《诗》授哀帝	339
主要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6

结言

《诗》学是两汉经学的重要内容。它的发生、发展和最终结局是政治规律和学术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折射了两汉政治生活和经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大致内容。

汉代传《诗》者四家，鲁、齐、韩三家并立学官，是两汉《诗》学主流。《毛诗》行用于河间，在天子朝廷未立学官。三家《诗》属于官学，讲究通经致用，在政教方面影响甚巨；但“通经致用”的特点发展到极端，便背离了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毛诗》属于私学，内容较为平实，至东汉后期，经卫宏、贾逵、马融、郑玄诸大家弘扬阐发，影响渐著。自汉末郑玄笺《诗》之后，《毛诗》独行，三家继废。

关于三家《诗》亡佚的时间，《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①根据清儒的研究，唐时尚存的《韩诗》，最终亡于两宋之交。^②流传至今

^① [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18页。除注明外，后文所引《隋书》，皆用此本。它书之引用类此。

^② 《四库全书总目·三家诗拾遗提要》：“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矣。”

的，只有一部已非原貌的《韩诗外传》了。但三家《诗》毕竟是两汉《诗》学的主流，是“昌明时代”和“极盛时代”^①中国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欲了解两汉《诗》学全貌，就必须致力于鲁、齐、韩三家之研究。以三家《诗》作为切入点，可以较为方便、深入地考察两汉的经学历史和政治变迁。

早在宋代，一些学者便已开始关注已经亡佚的两汉三家《诗》。朱熹在《诗集传》中多次征引三家遗说，他的有些发明也能从两汉三家《诗》中找到源头。^②王应麟受朱氏启发，以存亡续绝为己任，撰成《诗考》，开三家《诗》辑佚之先河。明代冯复京取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六家释名物之说，辑为《六家诗名物疏》，书中常常征引三家遗说以定毛、郑、朱《传》之非，四库馆臣谓其“征引颇为赅博”、“议论皆有根柢”^③。清代学者以其辑佚补亡之长技，在前人特别是王应麟的基础上，对三家《诗》佚文遗说进行了全面搜讨。乾隆时期有卢文弨《诗考校注》、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严蔚《诗考异补》、胡文英《诗考补》、赵怀玉《韩诗外传补逸》、周廷采《韩诗外传校注》。嘉道时期则以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为代表，其他如阮元《三家诗补遗》、丁晏《诗考补注》、臧庸《韩诗遗说》、陈士珂《韩诗外传疏证》、吴棠《韩诗外传校注》等也都用功至深，见解深刻。晚清则有顾震福《韩诗遗说续考》、陶方琦《韩诗遗说补》、俞樾《读韩诗外传》、龙璋《韩诗》等，尤其是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为历来辑集三家

^① 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94页。

^② 参见本书附录三《〈褰裳〉朱熹“男女相咎”说探源》一文。

^③ 《四库全书总目·六家诗名物疏提要》。

《诗》佚文遗说的集大成著作。前人特别是清人三家《诗》辑佚的丰硕成果，为今天研究三家《诗》、较为全面地了解两汉《诗》学史，提供了方便，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①

截至目前，有关两汉《诗》学史的论著已经出现了不少。举其要者，有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今人钱基博的《经学通志》等，这些著作都把《诗经》学史作为重点讨论的内容；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林叶莲《中国历代诗经学》、鲁洪生《诗经学概论》、洪湛侯《诗经学史》等，则各有侧重，专门探讨了《诗经》学史，其中对两汉三家《诗》学史多有涉及；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对研究两汉三家《诗》的授受源流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相关研究还有冯浩菲先生《毛诗训诂研究》、《历代诗经论述评》，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方以智《从诗到经——论毛诗解释的渊源及其特色》等，对研究三家《诗》学史均大有助益。

前人著作相关部分大都把三家《诗》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而且大都采用分专题叙述的方法。这些专题包括“齐学与鲁学”、“家法与章句”、“今学与古学”、“官学与私学”等。分专题讨论的好处是使读者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两汉《诗》学史的不同侧面，缺点是容易忽略《诗》学在两汉不同时期的发展脉络。事实上，两汉《诗》学不是一个静止的平面，而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三家《诗》虽然同处经学的“昌明时代”和“极盛时代”，但鲁、齐、韩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经过了两汉之交的政治动荡，这种“不平衡”还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明显转化。这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内容

^① 关于历代三家《诗》辑佚的成就，参见本书第九章。

之一。

本书采用排比史料、考订年代的文献学方法，对鲁、齐、韩《诗》各自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鲁诗》尚谨守，明礼制，至刘向而言灾异。《鲁诗》学术集团在汉初便已形成，以后又通过与武帝、昭帝、元帝、哀帝等几代天子的双向影响，从而极盛于西汉一代，具体标志是《鲁诗》派著名学者韦贤、韦玄成父子先后为相。《齐诗》重致用，尚事功，经过董仲舒、夏侯始昌、后苍、翼奉等几代学者的不断改造，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阴阳五行化体系；见于记载的西汉《齐诗》学者不如《鲁诗》那么众多，但他们的说解极富特色，至翼奉、萧望之、匡衡而臻于鼎盛。《韩诗》在西汉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弱，至蔡义、王吉而趋盛。

王莽代汉是两汉三家《诗》发展的重要关节点。在此期间，《鲁诗》受创最重，《齐诗》受益最大，《韩诗》学者已开始称言图谶。东汉初年朝廷矫枉过正，其所举措往往反新莽而行之。于是三家在东汉形成了《鲁诗》不衰、《齐诗》不昌、《韩诗》极盛的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早在王莽篡汉期间便已暗伏朕兆。东汉三家《诗》中，《韩诗》学者言符命谶纬者最众，《韩诗》在东汉的极盛应该与其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有关。

两汉之交的政治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本来非常明晰的经学授受体系，因此东汉经学师承关系远不如西汉那么明晰。

本书以时间为纲，以经师为目，结合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分别叙述鲁、齐、韩三家《诗》学史。具体做法是：（一）排比史料，以见同异；（二）考证年代，以见先后；（三）对相关学术现

象尽可能穷搜冥讨，考其渊源。对于一些重要经师，大都先考其行年，再述其《诗》说。这样做便于考见三家《诗》各自的动态发展过程，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作为政治史缩影的两汉《诗》学史的特质。

在章节安排上，除绪言外，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总述两汉三家《诗》学兴衰概况及其成因。这是全文的总纲，较为集中地展示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发现。第二至四章论述两汉《鲁诗》学史（其中第二章论述西汉《鲁诗》元王派，第三章论述西汉《鲁诗》申公派，第四章论述东汉《鲁诗》的发展），第五、六两章论述两汉《齐诗》学史，第七、八两章论述两汉《韩诗》学史。第九章叙述三家《诗》的亡佚以及历代学者对三家《诗》遗说的辑佚，交代两汉三家《诗》学的历史命运。

本书受益于前人学术成果，凡所征引，大都随文标注。行文中不便于标注的，凡所经眼，有益于本书写作的，也基本在参考文献中作了补充。

写作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称卓茂元帝时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李贤注云：“江生，鲁人江翁也。昭帝时为博士，号《鲁诗》宗。见《前书》。”^①但据《汉书·儒林传》，江公宣帝时征为博士，与李贤注异；博士江公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会议前已死，此又与《后汉书》卓茂本传矛盾。未知孰是。再如李固，王先谦据《华阳国志》李郃等共师司徒鲁恭，遂谓李郃从鲁恭习《鲁诗》，李固从郃

^①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69页。

家学，亦当习《鲁诗》。^①又《后汉书·李杜列传》载李固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对策引《周颂·时迈》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②王先谦则据李贤注引《韩诗薛君传》说，遂谓《韩诗》作“振”（《毛诗》作“震”），而未及《鲁诗》一辞。^③如此之类，是非一时难明，或随文指出，或志之于此，留待以后深入考证，或与学界同仁共勉。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谬之处应当不少，恳请方家指正。

①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3页。

② 《后汉书》，第2077页。

③ 《诗三家义集疏》，第1012—1013页。

第一章 两汉三家《诗》学兴衰迭代概观

两汉经学的突出特色是“通经致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汉经学史就是两汉政治史的缩影。两汉经学的兴衰基本上与两汉政治的变迁相始终，经学内部的此消彼长是不同时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其时经学经常涉及的内容（如礼制、灾异等）往往就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各派人物表达政治观点（如向天子、诸侯王上疏，诘难政治对手等）的工具。

两汉《诗》学历史是两汉经学历史的缩影。既有官学、私学之分，又有今文、古文之别，还有师法、家法之殊。这些情况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又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今文学属于官学，“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①。特别是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②。“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

^①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② 《汉书》，第298—299页。

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①。今文经学注意配合时政，讲究“通经致用”，在政教方面影响甚巨。随着经学的发展，其弊端渐渐显露出来。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一针见血地批评当时的不良学风道：“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②“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③到了东汉，今文经学内容日渐空虚烦琐，终于走向衰微。“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教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自是之后，虽数有补救，但总的来说是每况愈下：“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穢敝，鞠为园蔬，牧儿堯竖，至于薪刈其下。”桓帝以降，“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泰书经字，以合其私文”^④。古文经学属于私学，内容平实，至东汉后期，经卫宏、贾逵、马融、郑玄诸大家弘扬阐发，较西汉时期更有发展，逐渐取代今文经学，成为经学发展的主流。郑玄笺《诗》之后，《毛诗》独行，三家继废。

上述这些内容，前人已经言之甚详。本书着重关注的则是，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5页。

^② 《汉书》，第1970页。

^③ 《汉书》，第1723页。

^④ 《后汉书》，第2546—2547页。

三家《诗》在汉代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经过两汉之际的政治动荡，这个“不平衡”又出现了重大转化。

三家《诗》在两汉的发展大势，可分别用一句话来概括：《鲁诗》极盛于西汉，至东汉而不衰；《齐诗》盛于西汉，至东汉而不昌；《韩诗》西汉相对不显，至东汉而盛极一时。盛衰异势、彼此消长的关键，则在于王莽篡汉。

一、两汉三家《诗》学的不平衡发展

(一)《鲁诗》在两汉的发展概况

武帝方即位，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醇谨无他长”的丞相卫绾则突发惊人之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①董仲舒也上“天人三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②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③。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④。汉代儒术之盛，与博士之限于儒生经师，皆由武帝始。但儒学尤其是三家《诗》之影响汉朝政治，则远在武帝之前。在这方面，《鲁诗》表现尤其突出。

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交既至楚，便以他的同门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刘交本人“好书、多材艺”，尤其“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等都精于《诗》。^⑤这样，在刘交的推动下，楚

^① 《汉书》，第155—156页。

^② 《汉书》，第2523页。

^③ 《汉书》，第159页。

^④ 《汉书》，第172页。

^⑤ 《汉书》，第1922页。

王国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汉初《鲁诗》学术集团,为经学走向“昌明时代”^①作了重要铺垫。

《鲁诗》依靠政治力量兴于汉初,反过来又参与和影响着汉代政治。刘交后代习《诗》者众,向、歆父子更以极其活跃的政治、学术活动见证了西汉政权由盛至衰的主要过程。申公在文帝时期即以言《诗》最精为博士,虽然当时博士一职与武帝以后性质不同,但不可能不对文帝有所影响。申公弟子王臧事景帝为太子少傅,虽然后被免去,但对太子刘彻产生了重要影响,武帝甫即位,即改弦更张,欲兴儒学,便是明证。虽然在窦太后的强力干预下,王臧等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下狱自杀,刚被征来的申公也只得以病免归,但经学转盛的大局已不可逆转。

西汉景帝以后七代天子,武帝、昭帝、元帝、哀帝都曾习《鲁诗》。《鲁诗》与最高统治者的特殊关系,推动了本学派的发展。在这方面,齐、韩二家无法与之相比。

《鲁诗》西汉极盛的情况,《汉书·儒林传》作了很好的概括:“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

^① 《经学历史》,第40—64页。